

语言

第
卷

刘利民 周建设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Language & Speech

语 言

(第1卷)

刘利民 周建设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刘利民、周建设主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

ISBN 7-81064-171-9

I. 语… II. ①刘…②周… III. 汉语-语言学-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100 号

2RB1/10

YU YAN

语言(第1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5×1270 1/16 印张 19.5

字数: 263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学术顾问

王福祥 北京外国语大学
裘锡圭 北京大学
陆俭明 北京大学
蒋绍愚 北京大学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
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张炼强 首都师范大学

主编

刘利民 周建设

编委(按音序排列)

冯 蒸 黄天树 李均洋 林 立 刘利民 汪大昌 王 陆
周建设

目 录

- | | |
|-----------|--|
| (1) 张炼强 | 回顾为了前瞻 学养兼取中外
——为《语言》创刊作 |
| (3) 戴庆厦 | 汉语研究与汉藏语 |
| (14) 陆俭明 | 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王刚的老师”，却不能说“*他是王刚的教师”？
——配价分析的实际应用 |
| (30) 杨成凯 | 语法学原理和汉语语法的一些原则问题 |
| (49) 汪大昌 | 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的若干问题 |
| (59) 林连通 | 福建省永春话的鼻化韵 |
| (71) 司玉英 | 关于“字母”和“字”
——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
| (85) 朱金兰 | 对未来汉字简化的一点思考 |
| (89) 邱立志 | 谈多音包孕异体字的整理 |
| (94) 周建设 | 词项语义的认知研究 |
| (106) 李秋菊 | 从语义特征看“V 着”状态存在句 |
| (117) 邱艳霞 | 论形容词状语的多向语义指向 |
| (125) 程丽丽 | “N ₁ + P ₁ 得 + N ₂ + P ₂ ”句式中 P ₂ 的语义指向 |
| (138) 张炼强 | 试说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促进汉语修辞的发展变化 |

-
- | | |
|------------------------|---|
| (148) 王 宁 | 论甲骨文构形的分析与描述
——兼论“六书”用以分析古文字的局限 |
| (157) 黄天树 | 《说文》重文与正篆关系补论 |
| (170) 宋均芬 | 《说文》篆文隶变规律研究 |
| (194) 董 琨 | 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 |
| (206) 冯 燕 | 《圆音正考》定本与校勘记 |
| (232) 赵大明 | 《马氏文通》介词理论评析 |
| (245) 李均洋 | “回”“S”“瓠”神话学和宗教学的考察
——从这三个文字符号所看到的古代中日文
化交流 |
| (258) 徐一平 | 关于《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和应用研究 |
| (263) 李丽桃 | 汉语“请”同日语中“待遇表现”相关修辞的
比较 |
| (277) 欧阳启名 | 日本出土木牍书体分析 |
| (284) 隋 然 | 关于俄语指示性间接言语行为 |
| (294) [日]松尾良树
冯 燕 译 | 论《广韵》反切的类相关 |

回顾为了前瞻 学养兼取中外

——为《语言》创刊作

张炼强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就创办了展示研究成果，推动研究工作的刊物——《语言》。对首都师大来说，这是双喜临门。

首师大语言研究中心是一个跨系科的科研实体，它汇集了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和计算机系的语言研究力量，在汉语语法学、语义学、音韵学、文字学、应用语言学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进行攻关。

我以为，攻关的关键一方面是在充分占有汉语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规律，另一方面是适当吸取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帮助解决汉语研究的实际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攻关取胜缺一不可，甚至缺一不可的。缺少前者，攻关立足不牢，缺少后者，攻关难以高瞻远瞩。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立足于汉语，同时适当吸取国外的普通语言理论和方法，朱德熙先生、陆俭明先生立足于汉语，适当吸取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汉语研究者们从索绪尔、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中，从国外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中，适当吸取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当然，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根植于外语，而尽管人类语言有共性，汉语仍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外语，所以原则上只能适当吸取，绝不能完全照搬。语言事实不完全相同，就不能希企有某一种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完全适用于汉语的研究。更何况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本身，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适当吸取，可以理解为一个选择、改造、创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汉语研究，必须强调走自己的路。总之，一方面立足于汉语语言事实，另一方面适当吸取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当代汉语研究的

正确道路。

我想，这应该是首师大语言研究中心倡导的研究方法，赖以取得研究成果的保证，也同样是《语言》倡导的研究方法，《语言》应该成为反映这样的研究成果的阵地。

首师大语言研究中心虽然成立不久，但首师大从它的前身——北京师范学院的创建算起，语言研究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也算是源远流长。语言学界熟知的刘世儒先生、张寿康先生，对汉语研究作出了贡献。刘先生的《汉语语法教材》（与黎锦熙合著）、《现代汉语语法讲义》、《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张先生的《构词法和构形法》、《文章学导论》都是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著作。现代汉语教研室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至今仍然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它的作者是刘世儒、徐仲华、史振晔、陈兆年几位先生。其后张炼强、洪成玉、刘钧杰、刘庆俄等分别在汉语修辞学新体系的建构和领域的开拓、古汉语虚词和词义的研究、词典的编写、系列语文教学软件的研制等方面作出了成绩。现在，后继有人。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周建设教授以中西逻辑语义理论研究领先，刘利民教授、李均洋教授以对比语言研究见长。冯蒸教授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黄天树教授的古文字学研究，都成果迭出，多次获奖。此外，还有汪大昌、毛秀月、宋金兰、赵大明、隋然、杜桂枝、张淑荣、韩丽娟等一批科研骨干。在当今信息时代，语言的研究少不了同计算机打交道，较之前人，愈益任重而道远。

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又有同行专家的支持和帮助，首师大语言研究中心是大有希望的，《语言》也是有条件越办越好的。我们应该以此为目的，加倍努力。

汉语研究与汉藏语^{*}

戴庆厦

我认为，汉语研究必须与同语系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本体研究（包括通过方言、文献材料对汉语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的今天更应该强调这种结合。这对于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能够为汉语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

先谈谈汉语研究与同语系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汉藏语是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的简称。汉藏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特点异常丰富的语系之一。一般认为这一语系的语种在 300—400 种之间，使用人口在 12 亿以上。汉语是汉藏语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与同语系的藏语、缅语、壮语、侗语、苗语、瑶语等存在亲缘关系。我国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在众多的语种中属汉藏语的语言最多。汉藏语不仅语种多，而且由于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语言保留较多的屈折形式，而有的语言则以分析形式为主；有的语言是 VO 型，而有的语言是 OV 型；有的语言无声调或声调处于萌芽状态，而有的语言声调发展比较充分，等等。从历史的眼光看，非汉语的汉藏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汉藏语的古代特点或汉藏语在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其中也包括汉语古代的特点。因而，要科学地把握汉语的共时或历时的特点，不能不注意与同语系非汉语亲属语言的对比研究。

* 本文是在作者 1999 年 6 月 30 日应邀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作的讲演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汉藏语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百年历史，人们对汉藏语特点的认识不断在深入，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革新。到了近期，汉藏语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从单纯的语言描写转向语言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使语言研究进入更为理性的阶段。二是不断拓宽语言研究领域，重视不同方言、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从对比中发现新的语言特点、新的语言规律。汉语研究从重视书面研究转向重视口语研究，再到重视方言研究，每拓宽一步，都有很大发展。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的结合，符合上述趋势，因而必能有力地推动汉语的研究。

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结合，至今所作的工作还不多，还没有认真总结过，因而对其深层的重要性现在还不可能说清楚，有待今后不断总结、充实。不过，我想这种结合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 汉语研究能从同语系非汉语研究的成果中，加深对汉语特点的认识，扩大汉语研究的新视角。比如，汉语声调的研究至今只弄清中古阶段的调类分布，但对其起源问题还未解决；而非汉语的汉藏语声调的研究则走在前面，其成果可为汉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一般认为，汉语中古阶段已形成“四声八类”的调类系统，至于上古汉语有多少声调，说法不一。清代顾炎武认为古有“四声”，“四声一贯”；段玉裁认为有平上入三声，无去；周祖谟先生主张有“四声”；王力先生认为上古分“平入”两类，又各分长短，舒而长的是平声，舒而短的是上声，长入到中古变为去声。而非汉语的汉藏语声调研究，特别是藏缅语声调的研究，已部分地解决了声调起源和初始分化的问题，这是汉语声调研究所不及的。其中藏语声调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声调起源的分化规律。现已认识到，现代藏语声调的各种变异都是由古代藏语的“一舒一促”演变而来的。舒促两类的再分化，主要与声母的清浊和韵母带不带辅音韵尾有关。清声母音节分出高调类，浊声母音节分出低调类。藏语声调从无到有，与前缀音和辅音尾的大量脱落有关，是适应某些语音特征丢失的补偿物。有的专家认为，从七世纪藏文反映的语音特点看，那时藏语还未出现声调，但有大量的前缀音和辅音韵尾，但后来前缀音和辅音韵尾逐渐脱落，于是出现声调来补偿。^①就整个藏缅语族声调的特点看，声

① 见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

调产生与演变呈现出不平衡性，大致可分为发达型、不发达型、萌芽型、无调型四类。这四种类型反映了藏缅语声调产生和演变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从比较中可以看到：1. 藏缅语不同语言间找不出调类关系，不仅不同语支间的语言如此，甚至有的属于同一语支的语言也难理清严格的对应关系。这说明原始藏缅语还未产生声调，声调是后起的。2. 声调的有无或发达与否主要与声母、韵母的丰富与否正好成反比。即凡无声调或声调不发达的语言，声母、韵母都比较发达，反之亦然。这说明声调的产生与声母、韵母的丰富状态有关。3. 影响声调分化的条件有：韵母舒促、声母清浊、送气不送气、元音松紧、元音长短等，前两者最具普遍性。苗瑶语、壮侗语声调的源头虽未弄清，但其调类分布已大体弄清。一般认为这两个语族的调类系统都是“四声八类”；影响声调分化的条件最重要的也是声母清浊、韵母舒促。此外，还有元音长短、送气不送气等。^① 非汉语的汉藏语声调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汉语声调至少有以下两点启发：一是原始汉藏语是无声调的，汉藏语声调的起源是多源的，而不是单元的。汉语声调的出现是在汉藏语分化为不同的语族后才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远。二是汉语声调的起源虽然与藏缅语无同源关系，但由于相互间存在语言亲属关系，加上语言类型的相近性，在起源条件、分化规律上必然会存在某些共同特点。藏缅语声调产生的原因以及制约声调分化的条件，对汉语声调研究都会有重要参考价值。^②

语言特点有显性的，还有隐性的。显性的特点容易被认识，被注意；而隐性的特点则不易被发掘。但隐性的特点有的则能反映语言的深层特点。通过汉语和非汉语之间的相互映照，有可能更多地发现这些语言的特点，包括表层的和深层的。汉语有些隐性的特点在同语系非汉语里是显性的，通过对这些显性特点的分析有可能印证汉语隐性特点分析的正确与否。比如朱德熙先生曾使用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汉语“的”字，揭示了汉语“的”字分为“的₁、的₂、的₃”的几种深层类别，把汉语助词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③ 亲属语言“的”字的显性特点，能旁证朱

① 见拙作《藏缅语族语言声调研究》，载《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

② 见拙作《藏缅语族语言声调研究》，载《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

③ 见朱德熙《关于说“的”》，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5期。

先生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如景颇语表示“的”义的结构助词有 ai^{33} 、 a^{231} 、 na^{55} 三个，各有不同的语法功能。 ai^{33} ，主要用在修饰性的形容词之后，中心语名词之前，表示修饰关系； a^{231} ，主要用在修饰性的名词、代词之后，中心语名词之前，表示领属关系； na^{55} ，主要用在修饰性的名词、代语之后，中心语名词之前，表示后一名词事物是属于某一时间或某一范围的。这几种不同的词组结构，分别使用不同的“的”表示。例如：

sa^{33}	ai^{33}	ni^{33}	去 的 人们	去的人（多数）
$khje^{33}$	ai^{33}	$la^{31}pu^{31}$	红 的 裙子	红的裙子
$s\check{u}^{33}$	ga^{33}	$a^{231}ka^{31}$	老师 的 话	老师的话
nan^{55}	the^{33}	$a^{231}khe^{55}tan^{33}$	你们 的 铅笔	你们的铅笔
tai^{31}	$niŋ^{33}$	$na^{55}mam^{33}$	今年 的 谷子	今年的谷子
$k\check{a}^{31}$	nan^{55}	$na^{55}ma^{31}ja^{31}$	哪儿 的 人	哪儿的人

景颇语语法处于屈折型向分析型过渡的阶段，其语法形式有许多处于显露与非显露之间。景颇语表结构关系的语法意义，采用多样显露型的语法形式，正是由其语法形式由屈折型向分析型过渡的特点决定的。景颇语的“的”，在藏缅语大多数语言里找不到同源关系，这说明“的”字的出现与分化应该是后起的。但汉藏语各种语言都有“的”，而且有些特点相近，这是由其亲属关系和类型上的相近性决定的。^①又如，景颇语名词有由“个称”与“类称”构成的类称范畴。类称名词是在个称名词的基础上加配音音节或加另一名词构成，有其特殊的语法形式。例如： $nam^{31}si^{31}$ “水果”是个称名词，指具体的一个个水果；而加了配音音节的 $nam^{31}si^{31}nam^{31}so^{33}$ “水果类”的类称名词，则总称“水果类”。二者不仅语义不同，而且句法特点也有差异。其中一个特点是：个称名词能受数量词修饰，而类称名词不能。景颇语类称范畴是显性的，容易让人觉察二者的差别。汉语的名词虽有“个称”和“类称”的区别，但在词的形式上则是一致的。“我吃

① 见拙作《景颇语的结构助词“的”》，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过水果了”和“这个地方水果很多”两句，译为景颇语前者用个称名词 $\text{nam}^{31}\text{si}^{31}$ ，后者则用类称名词 $\text{nam}^{31}\text{si}^{31}\text{nam}^{31}\text{so}^{33}$ 。而汉语都用“水果”，但在两句中的意义不同，句法特点也不同。前者可以加数量词，如“我吃了一个水果”；而后者则不能。相比之下，汉语类称名词的特点是隐性的。景颇语类称范畴的特点，能够启发我们去思索汉语有无类称范畴。^①

把动词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两类，首先是在藏语里发现的。后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受到启发，也把它运用到汉语词类的研究上，并获得了成功。马庆株先生根据大量的语料对汉语的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两类动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并对比了二者的差异。还确定了区分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具体标准。最后认为“汉语动词由语义上自主与非自主的对立形成了一对语法范畴。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对语法结构有重大的影响，是汉语动词里的基本类别。”而且推想“自主范畴可能是汉藏语系的共同点之一。”^② 这是汉语语法研究与非汉语语法研究相结合取得较好成效的一个例子。

(二) 从汉语与同语系非汉语的同源关系和对应关系中，深化对汉语的认识，发现汉语的新特点。严学窘先生说：“经过李方桂、丁声树两位学者的指示：必须求助于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才能把汉语的历史扩展得比上古汉语更古一点。……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应求助于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是肯定的。”^③

古代汉语有没有使动范畴？一般认为古代汉语有屈折形式的使动范畴，这可以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一些残存形式。但光从汉语本身研究，难度很大。若能结合藏缅语，我看会有新的突破。藏缅语历史比较语法的研究已经证明，使动范畴是语法范畴中的一个最古老、最普遍的语法范畴，有可能通过亲属语言比较，从使动范畴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中构拟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原始形式。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现存语言都以分析式为主。但屈折式仅是一种残存形式，但从比较中可

① 见拙作《景颇语名词的类称范畴》，载《民族语文》1999年6期。

② 见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载《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

③ 见严学窘《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1988年6月），载《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3月。

以断定屈折式是古老的，先于分析式。屈折式有两种形式：变音式和加词缀式。变音式中又有多种形式，如加不加前置辅音、清浊交替、送气不送气交替、松紧元音交替、不同声调交替等。在这些形式中，加不加 *S 前置辅音应是最早的变音式，其它变音式以及加词缀式都是由这个源头分化出来的。屈折式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前置辅音与后面的声母合并，从复辅音声母变为单辅音声母，从而变为浊声母与清声母的对立。清浊对立的进一步演变，出现了多种形式。主要有送气不送气对立、松紧对立、不同声调的对立。二是前置辅音与后面的辅音分离，变为独立的音节，它已不再影响后面辅音的语音变化。^① 古代汉语的使动词，也有通过清浊对立表示的。吕叔湘先生在《说“胜”和“败”》^② 一文中指出：金文有败二例，一例是自败的意思，一例是败他的意思。^③ 藏缅语下面一组表示“垮、败”义的使动词，显然与汉语有词源上的关系：

	垮 (败)	使垮 (使败)
普米语	bie ⁵⁵	phje ⁵⁵
怒 语	bia ⁵³	phia ⁵³
景颇语	pja ⁷⁵⁵	phja ⁷⁵⁵ 或 [a ³¹ pja ⁷⁵⁵
载瓦语	pjo ⁷²¹	phjo ⁷⁵⁵
独龙语	bruut ⁵⁵	sə ³¹ bruut ⁵⁵
彝 语	bia ⁵³	phia ⁵³

如果能够从文献资料、方言材料中多找出一些汉藏语使动词范畴同源词，就有可能构拟出原始汉藏语使动词形式，这对汉语使动词范畴的历史研究会有很大帮助。

非汉语的汉藏语语言，有一些还保存有鼻冠辅音声母，如彝语、纳西语的 mb、nd、ŋg、ndz、nɛz、ndɛ 等。原始汉语的声母有无鼻冠辅音？张琨先生在《苗瑶语藏缅语汉语的鼻冠塞音声母——是扩散的结果呢，还是发生学关系的证据呢？》一文中^④ 通

① 见拙作《藏缅语族语言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载《中国语言学报》1999年。

② 见吕叔湘：《说“胜”与“败”》，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四），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③ 见严学窘《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1988年6月），载《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3月。

④ 载《史语所集刊》47本，1976年，英文版。

过“雪、猪、鱼、米、织、盐”等六个词的比较，把藏缅语的鼻冠音同汉语、苗瑶语沟通了，认为原始汉语也曾有过像藏缅语一样的鼻冠塞音，而且认为在谐声字建立时期，汉语仍有鼻冠塞音。后来，一部分鼻冠塞音变为鼻音和浊塞音，一部分未变。他还认为，汉语、苗瑶语、藏缅语的鼻冠塞音存在某些共同的演变特点，如鼻音使清塞音变浊（nt—nd），鼻音与塞音合并（nd—n）。如：“喝”一词，藏文为 N-thuŋ，彝语为 ndo³³。“吹”一词，藏文为 N—bud，哈尼语为 mǝ⁵⁵。他又推测汉语的“嚼”（𪔐）在原始汉语可拟为 * N-graug 或 N-kraug。这个词，纳西语读为 ŋgw³³，与汉语有同源关系。把“盐”（𩇛）拟为 * dza，原始苗瑶语为 N-tsr-。张琨先生还认为原始汉语的鼻冠音到了切韵时代全部演变为鼻音和浊塞音。即 N-g—>ŋ-, g-, N-k—>ŋ-, g-, k-。这项研究，开辟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新天地。

有的学者从藏缅语许多语言有松紧元音进而推测原始汉语有松紧元音，后来转化为长短元音。这个推测是大胆的，有启发性的。但随着藏缅语松紧元音研究以及汉语和藏缅语对比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这个推测难以成立。因为从来源上看，藏缅语松紧元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韵母的舒促，即松元音来自舒声韵，紧元音来自促声韵；二是来源于声母的清浊，即松元音来自浊声母，紧元音来自清声母。看下列韵母舒促和韵母松紧对应例子：

汉语		哈尼语	彝语（阿细话）
接	叶韵-p	t _s a ³¹	tse ⁵⁵
节	屑韵-t	t _s ɿ ³¹	tɕi ⁵⁵
八	黠韵-t	œ ³¹	xi ³¹
目	屋韵-k	mj	ne ³³
六	屋韵-k	a ³³	sa ³¹
		ku ³¹	tʂhu ³¹
九	有韵	ɣy ³¹	kw ³³
吾	模韵	ŋa ⁵⁵	ŋo ³³
三	谈韵	so ⁵⁵	si ³³
你（尔）	纸韵	no ⁵⁵	ni ³³

从松紧音演变的规律上看：松紧元音对立存在逐渐消失的趋势。其途径主要有二：一是转为舌位不同的松元音；二是变为不同的声调。原始汉语既有舒促韵母对立；又有清浊声母对立，就不大可能再有松紧元音对立。如果有，它又从何而来呢？^①

《切韵》纯四等韵齐、萧、先、青、添诸韵（连平、上、去、入共十八韵）的主要元音是什么？各家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前面有个介音 i，有的认为是元音 e，有人认为主要元音是 ε 等。马学良、罗季光先生根据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存在长短元音的区别，提出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是长元音 i：- 的新见解。他们从分析这些非汉语的长短元音对立的各种变异现象中，指出：“将上述汉语元音长短的一些现象跟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元音长短现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有极相似的地方。……可以设想，在汉语发展的某一阶段里，元音长短也跟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一样组成了长短的‘系统’，系统瓦解后，长短逐渐消失，这才成‘遗迹’残存在现代方言中。汉语既然跟这些语言有亲属关系，残存的长短现象又很相似，它们之间应该有极为类似的发展途径。这种设想应该是合理的。”尽管这种假设并不一定就成为最后定论，但其思路对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无疑是开辟了一条新路。^②

（三）在研究方法上，非汉语的汉藏语研究会为汉藏语以及汉语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发。比如传统使用的分析汉语音节的声韵调分析法，是一个非常适合汉语特点的语音分析方法，应如何认识其科学性？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至非汉语的汉藏语领域，就能认识得更清楚些。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非汉语的学者也都习惯地使用声韵调分析法，不约而同地认为它是分析汉藏语语音结构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声韵调分析法为什么能够这样广泛地被运用在汉藏语研究中，而且能成为语言学家乐于使用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声韵调分析法在长期的实践中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中间必然含有其合理的内核，即有其与具体语言相适应的属性。双声叠韵词在汉语里非常丰富，在非汉语的汉藏语里也是一样，都具有普遍性，而且还具有古老性。这说明说汉藏语的人

① 见拙作《藏缅语族松紧元音研究》，载《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3月。

② 见《“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载《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

早已具有区别声韵的天然语感，即把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的能力，这成为后来人们分析字音的基础。汉藏语的单音节性且形态变化少的特点、音节结构以声韵调为子单位体现其内部联系的特点、历史音变以声韵调为单位互为条件的特点等，决定了分析汉藏语语音结构以声韵调分析法最为合适。这套方法又能吸收音位分析法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其更有效地用于汉藏语语音结构的分析中。非汉语的声韵调分析法，对汉语语音结构分析能够起到证实、补充的作用。

二

研究汉语的大师们早已认识到汉语研究必须与非汉语研究相结合，而且认为这是深化汉语研究的一条必经的途径。早在1939年12月29日，李方桂先生在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做的题为“藏汉系语言研究法”的讲演中，就已明确指出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他说：“我并不希望，比方说，专研究汉语的可以一点不知道别的藏汉系语言。印欧的语言学者曾专门一系，但也没有不通别系的。就拿汉语说，其中有多少问题是需要别的语言帮助的。单就借字一个问题在研究汉语的历史看来，就没有人有系统地作过，……”最后他总结说：“所以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藏汉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的系统研究。”^① 1989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22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上，朱德熙先生曾在会上谈到必须加强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结合。在会下还对我说，研究汉语语法要注意方言语法，还要重视亲属语言的语法。季羨林先生最近强调：“要进行认真的汉语与同一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从而真正摸索出汉语的特点。再走《马氏文通》的路子，已经不合时宜了。”^②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努力实践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的结合，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总的看来，所做工作还不多。这当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一、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比，发展很不平衡。汉语研究，由于历史较长，研究的人较多，加上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

^① 载《语言应用研究》2000年第1期“卷首语”。